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为《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而作

[美]

田心源

人口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是曲折蜿蜒的。从本世纪初到承认“人口”是个问题的六十多年中，这门学科在高教研究机构中是忽现忽隐的，专门调查、分析和解释人口变动因果的阵容也是盛衰无常的。即在“人口”问题的定义和幅度上，见解也是反复波动的。这些往事是可以理解的。人口是政治、经济情况进退的主动变量，但也同时为政治、经济演变的被动变量。它们中双向相互影响是复杂的，也是极其微妙的。因而自古至今，处理人口问题之道经常是曲曲折折的。特别是在过去一些年代之中，中国的人口问题认识受国际因素的影响极大。再加上国内政、经格局中的变动，人口学被封为“禁地”。其处境在一段时期中可说是“山穷水尽‘已’无路”的了！

可鼓舞的是，人口学近十多年在国内已大大地超过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运，并已广泛地取得了国内朝野人士的支持。当然，人口学的东山再起无疑地反映人口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标明了众多学者在以往、当前和将来人口动态趋势上兢兢业业地摸索出的成就。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人口学能获得惊人的成绩可归综于众多原因，主要的是，打破了“闭门造车”这个框框，辟通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渠道。学术交流无争论地是中国人口学崭新演变的高速公路，但在这个捷径上驾车前驱之时，除非认清方向、把握日程和准备精妥，否则耗时、费油、甚至被迫耽误进程都非意外之事。在这方面要提高警惕的主要原因是，在国外兴起的人口分析程序和理论是有其一整套的前提与内容的。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口现象内质不同于其它国家的人口现象。人口现象包括生育、死亡和迁移。无论在任何社会国家之中，婴儿出生、生命终止或个体流动都是同一无别的“基本人口”现象。生、死、迁在中外是千篇一律的人生经历。但在数量上，这些现象在不同地区或年代中可能极不相似。数据质量的好劣会直接促进或阻碍人口学的进展和成熟。更主要的事实是：人口现象高低升降的前因与后果在不同地区或年代中会大有出入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外人口学的成就一是不外于在因、果这两个领域中的理论探索和检验，二是针对这些国家社会内的人口现象变动作研究，其目的通常不涉及普遍性的“人口规律”的创建。这当然不是说，这套国外东西在分析中国人口现象上无用武之地。这只是指出在采用引进的程序和理论时，要彻底地摸清其中的背景与来龙去脉。要不然在应用上、解释上可能会文不对题或题下无文。比如，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说，能影响生育率高低升降的宏观“主动变量”为数众多，包括生产技术、能源、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等的差别。这些主动变量可能解释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生育率上的高低差别，也可能有助于了解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内不同地区间高低生育率并存的情况。可是在探讨一个发达国家内存在的生育率差别和波动时，这种宏观分析方式会给人有隔靴抓痒的感觉。比如，二次大战后，生育率在众多的欧美国家回升，不仅中断了自19世纪末期以来的延续下降，并同时极快地跃回到了本世纪初的生育水平。这种意外的回升持续20年左右后，生育率又转低，接着

再出现向上趋势。发达国家中的忽增忽减的生育波动显然不同于历史上从高到低的生育转变。这种生育行为虽仅为短暂性的升降，但极深刻地反映一般夫妇根据自身情况而采取的生育决定。面临这批二次世界大战后突起的生育现象，国外人口学者研究方式也随之转变。微观分析程序和理论循势纷纷而起。

惹人注意的创新统为人口社会学家与人口经济学家的贡献。读者会很快地在顾宝昌博士和他同仁选译的文章中，同他们提供的概念和理论逐一见面。他们的共同前提之一是，生育分析是行为科学的新领域。开发这个领域的策略与工具是根据微观性经济学、社会学理论铸造的，生育行为因而被概括地称为“社会文化规范”或“经济利益得失”举动。“理想家庭”规模、“生育愿望”、“期望生育数量”、“儿女的价值”、“世代间的财富流溢”等等概念和论述散见于人口学调查报告与学术著作之中。

当然，人口学者之间对以经济观点来分析生育行为的策略也并非无争论的。比如，经济学者指称婴孩为“消费品”一举曾引起社会学者的反驳。即国外搞人口学的同行在事业上虽有同一的前提，但并非也不可能意见同一的，人口学的进展正是靠他们坚持争论而取得的。其中的枝节是众多的。但这里，应着重强调的一点是，当代国外人口学者设计的众多微观分析模型有着一个更主要的同一前提。

这个前提是，生育的高低升降是夫妇能自觉地采取决策的表现。决策的重要内容包括他们对自身当前和将来生活情况的估计与预测。这批估测概念可为分析生育行为中的“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夫妇生儿育女多少的打算不但反映他们成家立业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可源于他们童年的情况与经验。当然，在生育上“夫妇自觉选择”的落实并非超社会规范的主观行为，而有其客观条件的。这就是说，微观生育行为分析模型的兴

起与传播的环境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情况是大有出入的。

突出的差别是，在过去20来年中，计划生育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中国仍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但生育率却在极短时期内大幅度地下降。无疑地，在这空前的生育转变上，计划生育措施落实发挥了极大的诱催作用，即外在的因素高速地影响了夫妇间的生育行为。由是，在研究中国生育时，微观分析模型运用必需慎重从事。一个极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生育率转变在不同地区中有其显著的差别。一般来说，较发达富裕省市在生育下降幅度上占领导地位，这极可能是，发达富裕省市内的条件较成熟，“节育文明”较普及，因而在生育行为上，夫妇自觉选择性较高，避孕上有较积极的成就。微观分析在中国人口学研究中是有其一席之地的。

当然，从计划生育措施落实上来说，夫妇自觉地选择少生是一个重要关键。比如，近几年来，在讨论婴孩死亡、老有所养时，主要看法是，抓计划生育必需包括创建促进夫妇自觉选择的宏观条件。人口老年化、退休、老年保险之类问题的研究是与计划生育工作密切相关的。人口学者在这方面能够也应该作出巨大的贡献。同时，需要注明的一点是，在人口现象研究过程中，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可各自而行的，但人口现象的转变或恒静实际上是宏观、微观因素合并影响的趋势或状态。根据国内人口转变的趋势和国外人口学理论分析上的演进，中国人口学探索应走“多层分析”之道，即分析模型建立在宏观变量与微观变量结合上。在这方面，顾宝昌博士及其同仁忠实地把一批国外人口巨著译介给中国人口学界，这就为教研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读者在翻阅学习这些著作时，一定会得到深刻的启发，并有可能随之提出更崭新的见解与理论来。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俄亥俄

州立大学)